

文章编号: 1674 - 5566(2012)05 - 0917 - 06

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觉醒视角的魏源“海国”理念探究

李强华

(上海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坚船利炮”的方式一度显示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强势。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统治者一直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海洋从来没有被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范围。鸦片战争后,如何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执行什么样的海洋战略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变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力图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海洋文明强盛的根源。魏源吹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角,主张改漕运为海运、发展海商、巩固海防、建立新式海军、掌握海权,期望中国通过发展海洋文明而成为一个能够足以“制夷”的“海国”。魏源的“海运—海商—海防—海军—海权”的“海国”理念标志着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觉醒。随着西方海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国人的海洋意识逐渐从增强“海上力量”过渡到争取“海洋权利”的转变。

关键词: 近代;海洋意识;觉醒;魏源;海国

中图分类号: K 825.81

文献标志码: A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统治者一直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海洋从来没有被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的考虑范围。鸦片战争后,如何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执行什么样的海洋战略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西方列强的强大“动力”与其海洋文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海洋象征着国际贸易、环球市场与世界资本。西班牙、荷兰、英、法、德、美诸“海国”的现代文明无不发端于大航海、大海运、大海商、大海军,无不因海洋而崛起。在西方列强凭借其海上霸权入侵中国的时候,作为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魏源提出了“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2]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主张改漕运为海运,由海运而发展海商,由海商而建立新式海军,由拥有强大海军而掌握海权,期望中国通过发展海洋文明从而成为一个能够足以“制夷”的“海国”。魏源的“海运—海商—海军—海权”的“海国”理念表明了战争以最残酷的方式催促着近代国人海洋意识的觉醒。

1 由漕运到海运:发展海上运输业

在世界“大航运”的时代背景下,魏源改漕运为海运的主张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运输方式改革,也顺应了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海上运输业的潮流。

1.1 清代漕运危机

清代漕运是指清廷定都北京后,为解决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米、八旗兵丁口粮以及京师民食之需,沿明朝旧制,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等省征收漕粮经运河运贮北京通州各仓。我国的漕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海运漕粮则起于元朝,在清朝道光年间开始雇用商船海运漕粮。清朝和元明时代的海运不同主要表现在清朝开始用“商运”替代“官运”,“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3]。清朝漕运危机早在1803年就已见预兆,一方面由于黄河多患、淤塞,使开往京师的运粮船运行不畅;另一方面,漕粮从征收、交

收稿日期: 2012-05-08 修回日期: 2012-05-3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12YS075);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社科项目(A-0211-11-0000-0217)

作者简介: 李强华(1975—),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E-mail: qhli@shou.edu.cn

兑、转运到入库的过程中,遭到官吏盘剥勒索,发展成为一种苛政,漕费高昂,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当时一些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海运的理由主要有表现在:“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舵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贲”^[3]。但实际上,这些反对海运的理由并不充分。就盗粮而言,由于北洋水浅多礁石,而盗船基本上都是鸟船,会因为吃水太重而一遇即碎,所以根本不可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就海运的危险性而言,上海沙船有三千五、六百号,每年往返四、五次,每岁漂没之数不到1%,性并不高;就运输的代价而言,以全漕350万石折算,较河运可省费用十之六七。道光五年,由于运河水道淤塞,漕船搁浅,漕粮难以运抵京城,漕运危机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对漕运进行改革。

1.2 主张改漕运为海运

魏源认为改河运为海运是“因时因地制宜之法”。首先,海运是合乎时势。魏源认为“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行海运必今日,其诸至创而至因者乎!……河运通则渎以为常,河运梗则海以为变,是之谓时势。因势之法如何?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费不别筹也。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4]。河运与海运本无优劣之分,只是当今条件发生了变化,河道阻塞,选择海运是时势所造;其次,合乎地理条件。魏源不仅注重因时制宜,而且非常重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漕运还是海运。魏源主张江苏必须实施海运,而江西、湖广远离大海,依然使用漕运;再次,合乎各方利益。海运是“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4]。在魏源看来,海运利国利民利商,是至今未有之好事,漕运之弊彰显了海运之利。依靠海洋文明发展起来的列强在中国近代充分显示其威力,让近代国人认识到了“海洋性国家的经验”的重要性。与那些反对海运的顽固派不同,魏源吸取了“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并从利国、利民、利商方面论证了改行商船海运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破除了海运“风涛”之险、“海盗”之患及“霉变”之损的思想疑虑,并对反对海运阻力的根源作了深刻揭露。

在魏源及陶澎、贺长龄的积极筹划下,道光六年第一批漕粮海运获得了成功。在世界“大航运”的时代背景下,魏源的改漕运为海运的变革思想体现出他对时势、利弊的把握,在面对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过程中,中国必须改革积弊以迎头赶上。

2 由海运到海商:发展国际贸易

“重农抑商”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南宋以降,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王源的“本宜重,末亦不可轻”都从不同程度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面对清政府闭关锁国带来的国力积弱及世界海国贸易的繁荣景象,魏源强调了中国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要性。

2.1 对禁止与国外贸易的反思

19世纪海洋时代的西方国家借其发达的海洋经济疯狂地对外扩张,中国鸦片战争的奇变使得以魏源为代表的包括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在内的经世派思想家们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林则徐很早就意识到发展对外贸易的好处,如果禁止国民与国外贸易,只会拱手把利益让给外人,通商同样也可以增加关税,“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5]。在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及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时,魏源指出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林则徐的禁烟政策,而是因为清政府停止了与外商的正常贸易,“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祥情者,则知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6]。造成国家贫弱的原因是“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6]。

2.2 “款夷”思想的提出

面对如日中天的西方海洋经济的发展,魏源提出“款夷”思想,即反对封建顽固派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走私的同时,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当的经贸交流,向外国购买造洋舰洋炮和“有益民用”的货物。魏源指出,“吾曰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痍,曰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竭中国之脂,何以

禁其不来,则不计也。设有平秀吉、郑成功枭雄出其间,藐我沿海驰备,所志不在通商,又将何以待之,则亦不计也。与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则求之也备,岂暇与囊瓦、靳尚之徒较量高下哉?”^[6]魏源看到了列强的侵略既不是因为禁烟,也非因为与中国的贸易被禁止,根本上源自于其殖民政策中的利益驱动。因此,只有通过广泛开展同各国的贸易,打破英国“兵贾相资”的贸易垄断才可以“合诸国以制一国”。他认为可以与英国约定,如果不输入鸦片则可尽裁一切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一方面让外国商人可以获利,另一方面中国可免遭鸦片的毒害,白银也不会大量外溢。魏源还主张以货易货,“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7]。中国以出口茶叶与湖丝为主,外国的棉花、洋米、呢羽,则可适当进口,此外有利于我国经济 and 国防的铅、铁、硝、布等均可以进口。魏源提出以白银为本位发行货币,但货币发行的原则应该是为了便民,而不在于罔利。为了抵制外国银元的垄断地位,可以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仿番制以抑番饼”,同时他还建议开采银矿以增加银源。魏源所处的时代,海运依然停留在海洋运输漕粮的理念,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赋予了海运新的诠释,海运包括远海交通和国际互市等理念。比如光绪六年,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云:“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8]。

2.3 坚持“海商”的时代意义

海权论专家马汉曾经说过,很多国家都看到了海上贸易对增强国力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面临海上贸易利益不均衡时,如果通过立法而不能实施垄断的话,那么就会用武力来排斥外国人的贸易^[9]。面对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毫无平等可言的时代背景下,顽固派更多的是“限制外国的贸易”,而魏源主张通过海商发展对外贸易,不仅顺应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推动了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来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思想固然可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反映,是自明天以来不绝如缕的“工商皆本”的新鲜思想的延续;同时它也开始作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观点

的媒孽而出现了。在世界“大海商”的时代背景下,魏源清楚的认识到了海上贸易对国家财富和实力的影响,唯有开展“海商”才会给中国带来富强。

3 由加强海防到建设海军:维护中国近代海权

中国近代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现实目标就是追求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强,渴望能够制造出足以与列强相抗衡的武器装备。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嘱托,编撰了当时中国最为完备的介绍世界各国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风土人情的《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序言里魏源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4]。这一命题是魏源在对林则徐思想总结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命题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防”的保守观念,在新的历史境遇下重新审视过去“蛮夷”和当下“外夷”的不同,当下的拥有先进科技的代表着域外文明的“外夷”与过去只知抢掠财物的“蛮夷”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3.1 海防新论的提出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对于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在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7]。只有善守才能善战,只有善战才能善“款”。至于如何去守,魏源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内守坚固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外攻的方针,内守可以与外攻相结合。无论是内守还是外攻,要想能够抵抗西方列强,首先得去了解列强的国情,而要了解国情,就得翻译西方科学论著,“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6]。善与不善向列强学习是决定对抗成败的关键,“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6]。而“师夷”的关键就是改善武器并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魏源海防论中最精华的部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看到了先进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所以在晚

清这段历史上,海防的焦点问题始终集中在如何改善武器装备和是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

3.2 主张加强海军建设

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向西方学习被看成是近代中国第一缕思想解放的曙光。魏源明确提出“尽收夷之长技为我之长技”,在他看来,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7]。就“战舰、火器”而言,魏源认为可以通过购买解决。他倾向于购买的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船炮质量上乘,其精密程度极高,比如在谈到火炮时魏源指出,“水战之器,莫烈于火炮。有守炮,有攻炮。其制莫精于西夷,其用莫习于西夷,与其制之内地,不如购之外交”^[7]。船舶也是“为四夷哨探报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国专门工匠,即出外交兵,夷商亦用之而不得其法,断未易于创造”^[7];二是只有用西方自产的船炮才可以在战争中与之相匹敌,而质量低劣的国内船炮是难以与其相比的,“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盖夷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窳窳朽,不足遇风涛,安能遏敌寇?”^[7]据此魏源给出了具体的方案,“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购夷炮数位,或十余位,缴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功倍”^[7]。但是购买船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魏源主张在购买西方船、炮以解燃眉之急的同时,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自己生产,他给的方案是“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7]。就“养兵、练兵之法”而言,魏源不仅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更认识到了唯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才能更好的去使用武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强调军队的战斗力在于质量而非数量,他主张通过裁军的方式强化军队的精良,如果士兵的整体素质上去了,那么也就无患了,“今以招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7]他给出了选拔海军人才的设想,“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造飞炮火箭诸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颶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7]。魏源主张通

过改革科技考试的内容来鼓励人们对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学习,以培养急需的航海和军事人才。

3.3 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海权”一词最早源自于美国马汉的名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和马汉为列强侵略扩张提供理论基础的海权论不同,魏源的海权论主要表现在抵抗列强侵略的防御上。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的时候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当时是“海国”竞争的时代,“海国”凭借其海上霸权进行的疯狂的侵略扩张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不仅靠“船坚炮利”和训练有素的海军人才,更为主要的是列强掌握了海上霸权,列强凭其海权则“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恃其船大帆巧,横行海外,轻视诸国,所至侵夺”^[7]。魏源以英国为例,英国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基多,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以此“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7]。魏源认识到由于英国对海上霸权的控制,由对南洋诸国的侵占进而威胁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英国当时是最危险的敌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7]魏源意识到英国在侵占新加坡后,中国将成为其下一个侵略目标,“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文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国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7]。英国的海上霸权使其能够以武力为后盾而开展贸易,掠夺中国利益,“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7]中国面对英国的如此强势,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其长处,阻止其侵略。要想制驭海权国家的侵略,唯有发展我国海权,发展我国海权就得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魏源还认识到列强侵略中国是以南洋为基地,所以东西海权争夺实在在南洋,因此还得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经营之以

为藩镇。

台湾学者王家俭先生认为魏源的海权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创设新式海军,二是发展工业与航运,三是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四是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他认为这些思想与美国战略家马汉的海权理论非常近似^[10]。马汉认为从广义来看,海权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利用海洋使自己强大的历史^[11]。其实较马汉更早的魏源早就认识到英国侵华的必然性源自于英国的世界殖民政策,英国为“张其国势”而“急于寻新地”。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用其海上霸权而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其世界殖民扩张政策的逻辑必然。魏源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阐明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进而提出中国必需了解西方并向西方学习,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而掌握海权才能在“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之际以“制夷”,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12]。

4 对魏源“海国”理念的评价

由于内陆文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海洋意识长期以来都十分淡薄,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国虽然拥有大片海域但并没有重视过对海洋的经略。在国防观上海洋一直被视为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而非开发利用的“宝藏”。中国历史上的海上征战多是以恢复政治秩序为目的,而非为获取海洋资源或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力量的竞争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正如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所言:“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13]。面对西方的东侵之势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理念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肯定主要限定于技与器之域,特别

是军事技术,试图通过师夷“坚船利炮”之长以制夷^[14]。魏源的海国理念并没有实现从向西方师“技”向师“道”的转变。魏源对西方列强的海洋战略之道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些局限性从他的海防战略中就可以透视出来,所以魏源与马汉的差距在于,“前者只是初步的经验体味,后者是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15]。21世纪,人类进入了海洋开发的新时代。不同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海洋文化因素,决定着竞争的成败。因此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突破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树立海洋意识,去面向海洋、走进海洋和利用海洋。

参考文献:

- [1] 鞠海龙. 中国海权战略[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11.
- [2]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34.
- [3] 包世臣. 包世臣全集(卷三)[M]. 合肥:黄山书社,1993:88-411.
- [4] 魏源. 魏源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07-411.
- [5] 林则徐. 林则徐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885.
- [6] 魏源. 魏源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02:1-1077.
- [7] 魏源. 海国图志[M]. 长沙:岳麓书社,1998:26-1649.
- [8]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M]. 南京:金陵书局刻本,1905:30-32.
- [9] 罗伯特·西格. 马汉[M]. 刘学成,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22-200.
- [10] 王家俭. 魏默生的海权思想[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19-233.
- [11]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海权论[M]. 范利鸿,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
- [12] 盛邦和. 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J]. 福建社会论坛,2010(6):88.
- [13] 钱穆. 国史大纲(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
- [14] 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6.
- [15] 王宏斌. 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

An examination on Wei Yuan's the "ocean country"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ean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in modern age

LI Qiang-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techniques of strong ships and guns showed that ocean civilization of western powers was strong. Before the Opium War, Chinese rulers recognized the sea as external natural defense "the Great Wall". The ocean had never been incorporated into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has to face the problem of how to face the threat from the sea and perform what marine strategy. As a modern thinker experiencing the Opium War, Wei Yuan put forward having the whole world in view, learning western strateg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strong root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ei Yuan advocated to use western good technology to control western countries. He advocated to transport the grain by sea instead of river, develop ocean commercial and new navy. He wanted that China could become a modern ocean country which could control western countries. As a modern Chinese thinker, Wei Yuan's ideas of "ocean transporting, ocean commercial, ocean defense, navy, ocean power" showed that Chinese ocean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sea power theor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ese marine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enhancement of "sea power" transition to strive for "sea right".

Key words: modern era; ocean consciousness; awaken; Wei Yuan; ocean country